# 第一章
# 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缘起与经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值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为坚持长期抗战，在华北和沿海沿江的大批难民和工矿企业纷纷内迁西南腹地的同时，濒于战火的几十所高等院校也络绎西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自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成千上万的教授讲师、职员工友和莘莘学子，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的根脉和精华，千里辗转，共赴国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育诗篇。内迁途中，他们冒轰炸，阅战乱，历尽颠沛流离之苦；驻足之后，他们含辛茹苦，胼手胝足，或夯土为墙、结茅为庐，或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陋就简，借祠堂、庙宇、民舍复课，甚至枵腹讲学与苦读，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不仅如此，内迁院校师生还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办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救国，兴教不忘民主和进步。在抗战岁月里，许多内迁院校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造就了大批革命者和民主斗士，亦为抗战事业和日后国家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还在盛极一时的大后方经济开发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将文明的种子、民主的精神和科技文化播撒在当时闭塞落后的西部地区。内迁院校自身，也在治校、教学、科研、育人及管理制度诸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们为中华的腾飞而努力振兴教育事业的今天，回顾民族危亡关头高校内迁的这段痛史，考察内迁院校的艰苦办学及其对坚持抗战和发展内地科技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部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学术专著，连论及这一课题的论文也很有限。若干有关院校的校史和各类文史资料所载回忆录虽有涉及，但既零星分散，又语焉不详。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高校内迁的考察较之工矿内迁的研究已远落其后，因此本课题的研讨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于是，便有了这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而其开篇所要述论的内容，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源流和迄至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概况。

# 第一节　抗战前的中国高等教育

## 一、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种起源于劳动的社会现象。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就有了劳动技能与生活知识的传授摹仿，教育活动由是发端。但学校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却是奴隶社会才出现的。据北京大学曲士培教授考释，大约在夏朝后期已出现学校。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开始分工，从而使一部分人从事教育和接受教育有了可能性。国家机构的产生，需要培养官吏，学校的出现也是为了适应这种需求。文字的产生，为学校的教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同时，为了认识和使用文字，也需要有学校来进行传授”。① 这是关于古代学校产生条件的极有见地的概括。

据古籍记载，自夏、商、周以还，我国便不仅有了学校，而且还有了大学和小学的分别。《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该篇还进而解释道：“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显然，当时的学校既是识文习射，培养文武人才的机构，也是尊养老人和进行祭祀活动“明人伦”的场所。另据《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

①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第 1 版，4 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为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见西周时代周天子办的大学叫“辟雍”，诸侯所办者则称“泮宫”。按《白虎通》和《尚书大传》等典籍的说法，当时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大夫等贵族的嫡长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余子十五入小学，十八人大学”。此种入学年龄和修业时期的限制，表明周代“学在官府”的大学教育存在着严格的宗法和等级界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周室衰微，国学渐废。诸子百家大兴办私学之风。秦灭六国，始皇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甚至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这应是秦朝短柞的重要诱因之一。汉代开始在中央设立最高学府太学。据《汉书·礼乐志》：武帝时，董仲舒曾建议举办大学（古文中“太”“大”相通），说是“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但其时武帝“锐意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到成帝时，刘向又主张“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成帝遂在长安城南营建辟雍。王莽时又扩大其规模，“为学者筑舍万区”。[①] 不久刘秀起兵，击灭新莽，建立东汉，称光武帝，年号建武。“建武五年(29 年)乃修起太学”。[②]《后汉书·儒林列传》还记载，东汉顺帝“乃更修黉宇，凡所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至三万余生”。[③] 众多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攻讦宦官，讥议时政”，成为时称“清议”的强

① 《汉书·王莽传》，载《汉书》，第 1 版，409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后汉书》，第 1 版，254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③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后汉书》，第 1 版，2547 页。

大舆论力量。于是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三年间，连续发生“党锢之祸”。太学生“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大规模镇压的学生运动。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天下分崩离乱，太学也时有兴废。到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成为又一最高学府和后世国子学、国子监、国子寺之滥觞。南朝的宋文帝在元嘉十五年（438年）创办了分别研究“玄学”、史学与文学、儒学的“四学”，颇与后来的单科学院相类似。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时，即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设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学生亦由千余人增至三千余人。[①]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用人注重门第，不论才德。这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隋开国后，文帝重教育，“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诏天下劝学行礼”。[②] 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国子监，辖国子学和太学。大业三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从而结束了九品中正制，成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先河，而太学与国子学也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唐宋两朝均承袭了这一制度。唐代于国子监属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前三学相当于大学，后三者属专科性质。宋代中央设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属于大学性质，它们和相当于专科的武学、律学统归国子监管辖，国子学为国家最高学

① 参见：《文献通考·学校考二》，第1版，考390页～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隋书·高祖上》，载《隋书》，第1版，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府。宋神宗时，王安石创“三舍法”，将进入太学的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太学为外舍生，而后“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① 上舍生成绩最优者可直接授官。这一制度有利于学生勤奋学习，也提高了太学的地位。

元初，蒙古统治者极不重视教育。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方“立国子学于大都”，“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② 在此前后，元世祖还先后设立了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培养本民族的高级人才。可见元代在教育上也有着浓烈的民族歧视色彩。进入明代，其中央设立的大学，初名国子学，后更名国子监。太祖朱元璋曾在南京鸡鸣山下建“京师国子监”。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又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而将原南京的“京师国子监”更名为“南京国子监”，明代的国子监因有南北之分。③

清统治者入关后，仍仿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在北京置国子监，又称太学。据《清史稿》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④ 国子监外，清代中央所设学校还有

①《宋史·选举志三》，载《宋史》，第1版，36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元史·选举一》，载《元史》第1版，20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明史·选举志一》，载《明史》第1版，1676页～16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清史稿·选举志一》，载《清史稿》，第1版，3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宗学、觉罗学、旗学、算学和俄罗斯学，地方则有统称为儒学的府学、州学、县学和卫学。这些学校一直到清末新式学堂兴起时才逐渐消亡。

在中国古代，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除了官学，还有民间的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建丽正修书院，七年后又改集贤殿书院，但当时还限于官方修书藏书，并非是教学机构。[①] 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学校停闭，便有一些文人学者在名山胜地聚徒讲学，由是奠定书院的雏形。两宋时期，因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兼因许多研究理学的名儒大师为阐扬其学术观点而广招生徒讲经论道，书院于是大盛。宋代最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嵩阳书院等。据曲士培教授统计，宋代新建的书院共203所，南宋占75%强。元代新建的书院共143所，其中江西最多为42所。明代新建书院共745所，以嘉靖年间所创215所为最多。有清一代，仍新建书院781所，创设最多的是康熙年间的233所。各省书院数量居前三位的是福建的181所，湖南的106所和广东的102所。清代书院纯官办者已达总数的78.74%，说明清代书院已经官学化了，而且多数书院也以考课为中心，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采纳张之洞、刘坤一建议，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改为学堂，绵延千年的书院制度终于寿终正

①《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221页。

寝。[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历朝历代，其所办学校的种类和施教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历来偏重于“明人伦”一类思想道德教育，而于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则颇为轻视，这表现在劝忠教孝和鼓吹封建伦理道德的礼、乐和儒学、理学一脉相承地成为历代最高学府辟雍、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根基，而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从来就被置于次要地位。隋唐行科举制度以后，虽然该制度使封建王朝有了选拔官吏的统一的知识才能标准，且调动了以入仕来求发展的莘莘学子的学习积极性，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和中国超稳定的封建体制，但是，科举制将学校置于附庸的地位，其僵化的程式化的考试内容与方式也摧残了学子的才智，窒息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在此种教育体制下，一度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和凋零。

## 二、近代新式高等学堂的兴起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凌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国救民，许多志士仁人放眼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法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力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60年代初，冯桂芬更提出“采西学”的建议。但当时所谓西学，还只限

①参阅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223页～226页。

于格致、舆地即西方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地理知识。遗憾的是，上述主张仍然遭到了那些死守封建教条，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清廷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他们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概斥之为“奇巧淫技”加以排斥，拒绝任何变革和改良。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一批买办化的官僚开始鼓吹“自强新政”，举办“洋务事业”。而创办新式学堂就是办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洋务派”的这些主张也为顽固派所反对。1860年发生了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毁圆明园之役，朝野人士大受刺激，对两种教训感触尤深：一是外交上“通事”的不可靠，于是痛感培养翻译人才的必要；二是因为列强舰船枪炮的可畏，于是痛感培养机器制造和近代海陆军指挥人才的必要。是年12月，恭亲王奕?奏请清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于语言文字悉能通晓，即行停止”。[①] 但直至1862年（同治元年）6月，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奏请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洋务运动中学习外语运动的开始，也是我国在外力的逼迫之下，逐渐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教育制度转变为采用西方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的开始。

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初，仅设英文一科，由英国教师包尔腾试教学生10人。翌年添加法文与俄文，1866年加授天文与算学。[②] 1871年设德文馆；1888年又开格致馆，

①总理衙门：《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版，3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

②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载上海书店编《民国丛书》第一编49，185页。

并设翻译处；1897 年设东文（日文）馆。[①] 据 1876 年（光绪二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课程，该馆学生“由洋文而及诸学共须八年”。其分年课目是：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②] 以此观之，京师同文馆乃是我国第一所以外语培训为主，兼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国语专科学校。

继同文馆而起的是 1863 年（同治二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方言馆。这两校的创办是由于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奏请，系“仿照同文馆之例”。但它们和京师同文馆又有所不同：一是它们招收的学生已不限于八旗子弟而有了汉人；二是其课程的设置除了外文，还兼习经、史、小学，颇有中西合璧的倾向。1893 年（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设自强学堂于湖北武昌，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后来将算学一门改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门停课。实际上自强学堂也成了“方言”即外语学堂，分英、法、德、俄四国文字。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湖南湘乡士绅仿自强学堂创办了东

①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史》，265 页～266 页。
② 参见：《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年刊，19 页～23 页。

山精舍。[①] 以上各校，皆属我国最早创设的首批外国语学校。

洋务派兴办的技术学堂，以 1866 年（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在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为最早。该校分为两部：“前堂”习法文，称“法国学堂”，研习制造与造船技术；“后堂”叫“英国学堂”，学习船舶驾驶技术。[②] 翌年，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又在上海制造局内奏设机器学堂，并附设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理化和工程方面的书籍，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只是该校并不偏重造船与驾船，而是一所普通的工程学校。[③] 继之而设的此类学校，还有 1880 年兴办的广东实学馆和天津电报学堂、1882 年设立的上海电报学堂、1892 年在武昌创设的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 1893 年开办的天津医学堂、1894 年建立的南京矿务学堂和 1895 年由津榆铁路公司承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等等。[④] 这些技术学堂的创办，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洋务派为求强军，还仿效西方办起了若干军事学堂。1880 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设天津水师学堂。该校分驾驶与管轮两科，开英语、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驾驶、重学等课程，总教习是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是我国近代海军军官学校之滥觞。[⑤] 稍后还有张之洞于 1887 年（光绪十三年）在广州黄埔创设的广东水陆师学

①参阅杨亮功：《我国高等教育之沿革及其进展》，载（台湾）中国教育会主编：《高等教育研究》,教育丛书(民国五十三年度),初版，12 页～13 页，台北，正中书局，1964。
② 王信忠：《福州船厂之沿革》,转引自 《清华学报》，1932 年，第 8 卷第 1 期。
③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民国丛书》 第一编 49，187 页～188 页。
④ 参阅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280 页～283 页。
⑤ 参阅：《万国公报》第 361 卷；(津门杂记）中卷，19 页～2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堂，1889 年（光绪十五年）丁汝昌在山东威海卫创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南洋大臣曾国荃 1890 年（光绪十六年）奏设于南京仪凤门内的江南水师学堂。这些学校所置专业与课程，大体与天津水师学堂相仿。陆军方面，仍以李鸿章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奏设的天津武备学堂为最早。该校聘有多名德国军官为教习，一方面轮流挑选各营弁兵入校学习西洋后膛枪炮、分合攻守各法，为士官教育的开始，另一方面，建立书院选募良家子弟肄业，以培养军事指挥人才。① 日后成为重要北洋军阀头目的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吴佩孚等均出自该校。甲午战败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各水师学堂大不如前，而陆军学堂则更兴盛。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武昌建立湖北武备学堂，袁世凯亦在保定创建直隶武备学堂。各省相继举办的陆军学堂还有设于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设于杭州的浙江武备学堂和设于太原的山西武备学堂等。

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上述单纯摹仿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的专科学堂和只习西艺，不学西政的作法颇受朝野质疑，于是创办普通西式院校的呼声日高。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设中西学堂于天津。该校头等学堂即普通大学，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科，学生修业四年毕业。1903 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时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该校初建时分为四院：师范院、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中学，也称二等学堂）和上院（即大

①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民国丛书》第一编 49，188 页

学,也称头等学堂)。[①] 其上院以培植政治专家为目的,盛宣怀在呈清廷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所附的《南洋公学章程》中称:“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基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学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习。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②] 对此,周予同先生认为:这是由“西艺教育”进于“西政教育”,中国士大夫阶级由接受西洋物质文明进而接受西洋政治制度的发端。[③] 但盛宣怀等人始料不及的是,由南洋公学演进而来的交通大学,却并未成为政治家的养成所,而变成了工程师的摇篮。

不过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都还算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充其量是普通分科大学而已。在甲午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之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法的呼声日亟,废科举、裁书院、办学堂,也是他们替变法开出的重要药方之一。1896 年 6 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上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毕业后“予以出身,一如常官”。他还提出设藏书楼、创

①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第 1 版,4 页~5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② 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附《南洋公学章程》,转引自《交通大学校史》,4页。

③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民国丛书》第一编 49,191页~192 页。

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建议，并预言这样做“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①] 据说这个奏折是出自于梁启超的手笔，在当时影响极大。光绪帝很快将其批交总理衙门议复，却被顽固派以经费困难而搁置。1898 年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并建议内廷设“学校局”专管此事。[②] 2 月间光绪帝再发上谕催办，总理衙门仍以“事属创始，筹划匪易”相推诿。同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③] 但顽固派仍敷衍延宕。在康有为的催促下，光绪帝于 6 月 26 日三发上谕，严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迅速覆奏，毋稍迟延”。有关衙门才请梁启超代笔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应是“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并提出两条办学方针：“一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学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学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还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④] 章程对课程设置作了具体规定，并

①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二），第 1 版，293 页～29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② 见《戊戌变法》（二），201 页。

③ 同上，17 页。

④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折、章程清单》转引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初版，133 ～147 页，上海，中华书局，1933。

规定各省学堂皆归京师大学堂管辖，由是奠定了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地位。

光绪帝批准了这个章程，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开始了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当年 9 月发生了“戊戌政变”，“百日维新”诸举全被推翻，惟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规模和教学内容已大不如前，仅设仕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院学习。12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课程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①] 1900 年夏，义和团进人北京，学堂停办，再后又在八国联军之役被毁。其房舍、图书和仪器设备大部分被俄、德侵略军先后占据和掠毁，中国人的大学梦再一次落空。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统治，声称要变法维新，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宣布要逐步废科举，令各省办学堂。1902 年初又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氏鉴于大学堂的残破，主张暂不办正式大学，先办大学预科及速成科。预科之政科含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艺科为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这是京师大学堂文理两科形成的雏形。预科生三年毕业，考试及格者可升人大学本科。速成科亦分二馆，一为仕学馆，为大学法科的前身；二为师范馆，为优级师范学堂的前身。翌年，又将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仍设英、俄、德、法、日语言专科，形成了当时

①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史》，见《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8648页～8650页。

京师大学堂的两科三馆制。至于当时各省，江苏改南菁书院为南菁高等学堂，浙江改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堂，湖北改两湖书院为两湖大学堂，湖南改求志书院为湖南大学堂，广东改广雅书院为广东省大学堂，陕西合并味经、崇实两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山西创设晋省大学堂，河南筹办河南大学堂。[①] 就连内陆的四川也仿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督奎俊上书朝廷，将著名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和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旋更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是近代四川第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高等学校。[②]

关于清季的高等教育，还须提及当时“新教育制度”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壬寅学制”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由张百熙所拟《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将高等教育分为三级：最高为“大学院”，招大学毕业生，该院不主讲授，不立课程，也不限定年限。次为“大学专门分科”，内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每科又再分若干目，相当于现在的专业方向。如文学科分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等七目；格致科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这是我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发轫。分科大学修业为三至四年，招收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的毕业生。高等教育的最低一级包括“大学预备科”、“高等学堂”、“高等专门实业学堂”和“仕学馆”、“师范馆”

①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民国丛书》第一编49—195页。

② 熊明安、徐仲林等：《四川教育史稿》，第1版，197页～19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等。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分别培养欲升大学各科的学生。高等学堂为各省区所设，规格低一档次。高等专门实业学堂属专业教育性质。而仕学馆与师范馆均为高等教育的速成科。以上各校，都招收各地中学堂的毕业生，修业均为三年。[①] 总的说来，“壬寅学制”在形式上是比较完整的，但它仍然散发着科举制度的腐臭。例如它规定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可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而科举出身者亦可入相应学堂就读。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订学堂章程，形成所谓《奏定学堂章程》，除规定学校系统外，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及学校设置办法。因是年为农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就高等教育部分规定：“大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并在大学堂原有的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的基础上，再增加“经学”一科，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十一门。文学科改分为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等九门；商科改分为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工科于原有八目外添“火药学”一门。另外，改“大学院”为“通儒院”，与现今研究院相当。大学的预备科以分科设立为原则，称“高等学堂”，规定各省城设一所，三年毕业。其学科预升经学、

①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民国丛书》第一编 49，196 页～19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